

◀ 新书 ▶

## 《再见巴别塔》

常江 袁卿 著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以非洲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作者以东非国家乌干达为落脚点，对数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访，并选取了三个人物重点介绍，力图为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中国和非洲这两种既相互抱拥又彼此陌生的文明，在“如胶似漆”中，混杂着误读与曲解。当中国人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东方古国与神秘大陆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精彩摘要】>>

### 中国人在非洲

相比欧洲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资本在非洲的广泛存在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用乌干达记者罗纳德·赛坎迪(Ronald Ssekandi)的话来说：“当年的欧洲人，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着枪，闯进来……”在他看来，现在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殖民者。诞生于2000年的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已形成统一市场，正在探讨推出单一货币，并可能结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目前的五个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三个主导性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历史上均为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国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对这一区域的影响，使得其他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进入变得非常艰难。这一历史与文化的缘由，自然也会加重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误解。

2006年，罗纳德·赛坎迪来了一趟中国，到了北京和上海。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真实的中国——城市的奢华、商业的繁荣、物产的丰饶，所有一切都令他震惊。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北京和坎帕拉差不多。“乌干达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时常把这一点挂在嘴边。”赛坎迪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如今是东非颇有名气的国际新闻记者，月收入1000多美元，是毫无疑问的精英。对于绝大多数连温饱问题都还有待解决的普通非洲人来说，“中国”不过是大街上越来越多的黄色面孔，他们在这里开公司、开餐馆、挖矿，很有钱，却也不好相处。中国人仿佛带走了很多，却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尤其是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持久发酵的东西，如观念、价值和文化。在非洲经商多年的李森对我们说：“尽管事业有成的自己已不可能离开非洲，但将来老了，还是会回到中国去生活。”很少有中国人会把非洲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哪怕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非洲的中国人基本只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的文化保守而封闭。与非洲人结婚生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个，也往往成为其他中国人的谈资和笑柄。即使如赛坎迪这样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从侨居乌干达的近一万人那里获得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恰当理解。

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作为记录者，我们不便去揣测。2012年7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新闻记者座谈会，邀请多位乌干达籍知名媒体从业者“头脑风暴”，讨论中国与非洲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误解的缘由。与会者来自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新华社，以及多家乌干达本地的重要报社与电视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东非名校马凯雷雷大学新闻传播系，有的还曾远赴英国接受教育。其中，供职于路透社的视频记者贾斯汀·德拉雷兹(Justin Dralaze)说出了他的感受：“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基本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

非洲华人社群的生活状况，似乎也确实如此。中国商人会组织小范围的华商组织，其现状几乎可以“山头林立”来形容。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无数个小圈子，不同的圈子自成体系，互不干扰。中国人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当地人？

【作者简介】>>

常江，传播学学者，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事文化研究、媒介批评、影视传播等领域的研究。

袁卿，新闻记者，现为新华社坎帕拉分社首席记者，从事非洲问题及中非关系相关领域的国际报道。

▲《再见巴别塔》▲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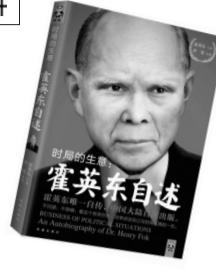


连载

14

凤凰网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本书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 我曾卷进“廖宝珊事件”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入。我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我虽然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题，但最后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我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实，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面子，二来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我早已在地产市场赚钱，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我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受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一万七千至二万八千个单位，地价下跌百分之七十，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大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之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法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法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最后，陈德泰被我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意即，以放弃订金为代价解除合约)，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盘就干脆斩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安排中资银行出资帮何贤度过难关。

1961年6月，我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四十年代初期来香港，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一亿元。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港府准备将他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三千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七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你度过难关。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因为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地产界有什么事都找我出面。廖宝珊与我尚算稔熟，他知道我除了有财力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人，地产界人士都尊重我，我的话在地产界有相当份量。

廖宝珊很焦急地说：“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度过这一关。”我问他：“你要我怎样帮你？”廖宝珊说：“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来，汇丰、渣打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但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我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于是，我委婉地对廖宝珊说：“老廖，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听我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我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对他说：“老廖，能帮，我一定帮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 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 报料电话：5200110

119

连载

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县，拳民教众火拼，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沉重？还是荒唐？是喜剧？还是悲剧？



### 拳匪做大 想绞杀为时已晚

袁世凯说话算数，午中的红烧鲤鱼实在是非常可口，整个珍珠泉大院里都飘起了香味。送信的骑手，一个北京话说的特流的蒙古族后生，应邀和袁大人同席。小伙子激动万分，称从来没跟这么大的官一起吃过膳。袁大人说，那你就进一次吧，喝足吃饱。但条件是你必须把北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真实说出。小伙子说，这算什么条件，袁大人，把您的好酒只管拿来。袁世凯知道蒙古兵好喝酒，就端上来好几坛子山东名酒景芝白干。几碗下肚，小伙子就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

袁世凯听后仰天长叹：“我大清毁也。拳匪之愚昧疯癫之气，百年难消；国家之伤痕重创之殇，百年难愈。苍天那，大地啊……”

蒙古后生直夸景芝白干酒有劲：“袁大人啊，听宫里的讲，皇上爷也是当庭恸哭呀。”

袁世凯的最大的本事在于，不管喝不喝酒，喝多少酒，头脑都能保持冷静：“老佛爷真是有些老糊涂了。当初，就该痛下狠手，将拳匪掐死与萌芽状态。现在倒好，痞匪已经做大。再想绞杀，为时已晚。前几日的八百里加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就在前日，同样是封八百里加急。但电文的内容却不是这种高调的宣战。而是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56)但仅仅是过了一天，朝廷的态度居然又变了，而且是来了个一边倒。

想到这里，袁世凯忍不住眼窝一热：“疯了，真的是疯了。大清帝国居然要一口气对世界上最为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开战。哈，这里边包括6年前在甲午一战中战胜过自己的日本，也包括15年前在马尾战胜过自己的法国，还包括60年前在东南沿海战胜过自己的英国。至于俄国，自打大清跟它打交道就从来没沾过便宜。还有那德国，当年为了两个传教士就可以要我山东。打吧，打吧，结局如何，才是真正的殊难逆料……”

在主张和实施东南自保运动中的几个封疆大吏中，袁世凯是个晚字辈，态度资历和威望及影响远不如当时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所以，一开始的运动初期，他一直按兵不动。这种按兵不动，实则是对东南互保的支持。即便是朝廷令他立即支援天津，他也是阳奉阴违。虽派出一支劲旅，但却总是徘徊在山东与直隶的交界处。这6营部队(约七千人)，直到天津陷落后才赶到。并很快就以天津已经失守为名而撤回了；同时扬言渤海情况亦紧急，洋人利舰多艘，游荡于我青岛、烟台诸港口，故不可分兵等等。这样，自始至终，袁世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参与京津的战事。即维护了山东的安定，又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一阵感慨后，公事还得干，公文还得发。当天，袁世凯就把八百里加急的电文发了出去。那么他发给了谁呢？

上海，电报局，督办盛宣怀官邸。午后的斜阳将其柔美的光洒向这座纯欧式建筑的小洋楼。站在二楼的阳台，可窥不远处的黄浦江入海口。不时的，会有几声长长地轮船的汽笛声传来。临街的大道上，依然是一派车水马龙。酒楼茶坊的喧嚣声，小贩沿街的叫卖声，黄鱼车的铃铛声似滚滚热浪迎面而来。与北京满宫的油滑京腔相比，充斥于满街的吴侬软语给人几分悠闲、淡定，甚至与世无争的感觉。自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廿六(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外商、外资蜂拥而至。短短的50年，上海已经发展成了东亚的一座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其间，除了在1860年至1862年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战乱外，上海一直没有经历过的祸乱。天佑上海。从而也保证了上海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经济氛围自然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上海文化。这种文化以一言以蔽之(要认真讨论续十万字)，就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挣钱、同时一门心思的想着花钱。其它窗外事，对不起。阿拉不太关心嘅……

这下午茶的滋味不错，盛宣怀连啜两口，又开始看他的每天必看的《字林西报》(盛宣怀1844年—191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字杏荪、幼勤，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其实，盛宣怀的官帽还有很多，如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招商局督办、京广铁路督办等等。我之所以专把电报局督办放在第一位，恰恰与袁世凯发来的电报有关。这就是说，袁世凯把电报首先发给了上海的盛宣怀！

正是因为这种职位的关系，盛宣怀第一个得知了朝廷的宣战诏书。

尽管56岁的盛宣怀正值政治上的老辣时期，尽管他凭着多年的官场磨砺对北方的时局有了最坏的揣度。但他看完电文后，还是出了一身冷汗。首先，他很快判断出这绝不是光绪皇帝的旨意，而是以太后为首，以载漪为主的后党派的歪招。再就是筹划着如何尽可能的减轻这个歪招带来的损害。他叫住了跟随多年的译电笔贴：“你立刻去把现在值更的电报员叫来。”